

中国古代对于医药人类学的贡献

刘 咸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民族繁多、人口兴旺，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发明文字——最早的甲骨文——以来，文化发达，先哲勤劳聪明、富有创作、文物资料，累积甚丰，经史志乘，诸子百家，汗牛充栋，其中蕴藏着大量文化科学素材，包括人类学资料在内，足供我们的发掘研究。

时至今日，人类学分门较前精细，以前仅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部门，现在一般分体质、文化、考古、语言人类学四门，也有再细分的，多达数十个分门，医药人类学是其中之一。

医药人类学在我国开始甚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示其重要性，既有高深理论，又能广泛应用，是体质人类学性质，又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康福利，古人有见及此，很早就认真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医药知识，足供后人数千年来的应用。近年更传遍世界，突破亚洲范围，用新方法新技术进行研究，推陈出新，成绩斐然。我国是发源地，宝库所在，仍居领导地位，中西结合，截长补短，前途发展，未可限量。兹就中国古代对于医药人类学的贡献试选五题，简介于后。

一 中国古代对于人体测量学的创始

中国古代医学经典与人类学有密切关系的是《黄帝内经》，采

用岐伯与黄帝对话方式表达医药理论。其中有很多记载关于人类体质描述和测量数据。据考据，《内经》大略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221—475），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由《素问》与《灵枢》两部分组成。《素问》着重论述基本理论，如阴阳、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丰富经验，其中不少至今仍广泛指导临床实践，共八十一篇，分编为二十四卷。

《灵枢》是最早论述针灸理论的著作，内容分论述经络、腧穴的分布、脏腑的生理、病机、营、卫、血、气的运行，针刺手法的运用。在两千多年前古人通过实践，认识到经络与脏腑的密切关系，从而为针刺治病和现代针刺麻醉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本书经宋人校刊分为二十四卷，共八十一篇。《灵枢》与《素问》两书内容大半相同，都是托名黄帝与岐伯讨论医学的问答，故中医又名“岐黄之术”。

《灵枢·经水篇》云：“若乎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这里所讲的显然是指人体外部形态和内部解剖，“解剖”名词见诸典籍自此始。

《灵枢·骨度篇》更讲到测量骨骼大小，体形长短数据：“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二寸”，“两颧之间相去七寸，两乳之间广九寸半，……足长一尺二寸，广四寸，肩至肘长一尺七寸，肘至腕长一尺三寸半，腕至中指本节长四寸，本节至其末端长四寸半”，《灵枢·肠胃篇》又讲胃的大小，长短，受谷多少，也有测量数据：“舌至齿长九分、口宽二分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舌重十两，长七寸，宽二寸半，……胃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经五寸而有小肠、回肠、广肠之分，回环叠转、胃肠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尺四分。回曲环返三十二曲”。甚为精审，这完全是人体测量的应用，近代体质人类学测量无以过之，软体部分的研究在一般专著中很多不及我国古人之详细，祖

国古籍中有此记录，许多人前所未知，舍己耘人，贻笑大方。中国古代度量衡比现代的小，应加注意。

以上所举外部形态，内部解剖和消化系统各器官的测量数据和活体解剖、人体测量学测量数据都很相同，其准确程度、颇堪惊人。近来有人将《灵枢》消化系统测量数据与德国人体解剖学家斯巴特霍尔滋所著《人体解剖图谱》作一比较如下：

	《内经》	《图谱》
食道长	1.6尺	25公分
肠道长	56.8尺	925公分
食道与 肠道比例	1.6尺:56.8尺 = 1:36	25公分:925公分 = 1:37

人体测量学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创立的一门科学技术，是体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体格检查的基本方法之一，就身高、体重、头长头宽、鼻阔鼻狭、胸围腰围、坐高肘长、手足宽狭、颜面垂度等特征进行直线、曲线、重量测量，再用统计方法算出平均数、指数、误差，以定形态指标；更作肤色、发色、肺活量、肌力等测量以定生理指标。研究不同年龄、性别、地区的人种或民族，采用人体测量学方法是一种重要手段，各国都广泛应用，著有专书。医学上则用以衡量人民健康情况和青少年发育正常与否的指南，此外，还可应用于日用品如衣服鞋帽家具，教室课桌等制造；交通工具驾驶员是否适合亦可根据人体设计，用途相当广泛，人类工效的研究，正在兴起，人体测量技术必更将精进。

想不到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先哲已作出许多测量数据，与现代人体测量学，医学解剖学上的数据，若合符节。肯定中国人是人体测量学的最早创始者，谁曰不宜。

二 中国古代对于血液循环的发现

在西方现代生物学史上，都承认血液循环的发现是近代生物

学基石之一，我国学者也习焉不察，人云亦云，视为当然。其实早在二千多年前，《内经》对此问题有真知灼见，不容含糊，也就是对于人体生理学有独特的阐述，《素问·五脏生成论》云：“诸血皆属于心”，“心主全体之血脉，……传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入经脉，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管阴阳”，“内溉五腑，外濡肌理”。这显然是在讲血液循环的道理，所谓“孙脉”是毛细血管，“络脉”是支静脉，“经脉”是大静脉。不过所用名词与现在生理学上所用不同而已，我国古人血气并称，总名为脉。

《灵枢·脉度篇》云：“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这就把心脏与血管联系起来了，把血液循环系统描绘出来了，并强调地说“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地运行，阐明了血液循环的一套完整理论。

我国古人这样明显地绘出了一幅血液循环图，可惜古时交通阻塞，世人不知，我们也没有大事宣传，致使科学真理沉睡地下达二千多年之久，诚可遗憾！

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人还不知血液是流动的，更不用说认识血液循环的道理，公元前二世纪时，罗马人只知道血液象潮水，而不知循环的现象，公元后十三世纪，阿拉伯医学才开始认识小循环，直到十七世纪，我国明朝时代，英国哈维（1578—1667）才证明血液循环说，说是西方的重要发现，但比《内经》所早已阐明的迟了二千多年，这说明体质人类学在中国二千多年前不仅有了萌芽，而且有科学记载。假使现代科学发明优先权能援引的话，我建议向国际科学史学会建议，请求审议更正，以符合事实，表彰前人的功绩。

三 中国古代对于法医人类学的贡献

体质人类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医人类学，包括勘验现场，检

验尸体或活体，物证，毒物以及其它有关材料的审查。我国南宋宋慈所著《洗冤集录》就是这样的一部书，亦名《宋提刑洗冤录》。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历任广东、江西、湖南等四省提点刑状官，办案注重实地检验，总结了前人经验和本人四任法官检验心得，著《洗冤集录》，于宋淳祐七年（1247）成书，五卷，内容分验复总说，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火死（烧死）、服毒、汤泼死、其它死伤情况，地望勘察、犯罪原因、作案动机、侦查手段、伤害赔偿等共53项，对于法医进行现场检验、鉴定死伤原因、搜集犯罪证据等等，都有一套实际方法，确系法医人类学的一部伟大著作，速成，立即奉旨颁行，成为当时刑狱官吏案头必备之书。随即广泛地、持久地传播，历元、明、清三朝七百余年，司法官员必读之书，工作手册，即在今天科学昌明，人类学大有进步，仍不失为重要参考文献，自晚清以来，本书被译成荷兰、英、德、法、意、日、朝、越等十余国文字，成为世界文库中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光辉篇章。

就作者所知宋提刑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人类学杰作，比十七世纪初期意大利法医学家查纪亚（1584—1657）所著《法医问题》，早三百余年。

四 中古代对于针灸人类学的创新

针灸学是用针法和灸法配合使用而治疗疾病的方法以调整营、卫、血、气，达到扶阳驱邪作用，在祖国医学上起源很早，《黄帝内经》中早有记载，到了现在更采用近代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加上医疗上临床实践、中西医结合，在经络学说和针刺止痛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针灸麻醉技术，是祖国医学宝库的一朵鲜花。

针灸学经汉、晋、唐、宋各朝不断研究，颇有进步，汉末名医华佗（?—208）善于针刺治病，施针用药、简而有效，又发明

“麻沸汤”，用于破腹开刀，是世界最早的麻醉剂。

魏晋间皇甫谧对于针灸大有研究，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根据《灵枢》、《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汇集整理而成，十二卷。书中阐述脏腑、经络、治疗理论等，并详载全身649个经穴部位和主治疾病，针刺分寸，艾灸壮精临床经验各方面。不言而喻，在确定全身649个穴位和一系列的医疗措施，必须有精湛的人体解剖、人体生理、人体病理的丰富知识为基础，方能准确奏效，这显然是长期积累经验和临床实践的结果，后人认为皇甫谧总结了晋以前各族人民以针灸治病的效果而有所发展。

下逮宋代，医药进步，针灸研究不曾间歇，且别出心裁，有所发明，王惟一奉旨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书成于天圣四年(1026)，考订了经络循行径路和腧穴部位，并详述腧穴的主治疾病和疗效，又根据图经铸铜人模型，刻示经络和腧穴位置。又绘制十三经图，总结十一世纪以前的针灸经络学说，王惟一铜人模型完全是根据人体外部形态和内部形态分脏腑十二经，旁注腧穴所会，通体内脏腑器官，体内贮水密缝不漏，以针刺穴，有水流出来，甚为灵巧，是世界最早的人体模型。图经刊行后，又刻石流传，宋代残石五块，于1965—1971年陆续在北京发掘出土，陈列在医学院。

铸造人模，刻定位置，并非易事，必须对于人体解剖有真知灼见，否则难免发生错误，王惟一模型能达到如此精确程度，必有精湛的解剖学知识，其造诣殊堪惊人，人类学与针灸学相结合，用能成此大功。医药人类学在我国早就建立起来了。

五 中国古代对于本草人类学的广泛研究

医药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草人类学，其古老略同于针灸

人类学，甚至更古老些，史称神农尝百草、辨性味——咸、酸、苦、辣、甜，后世就广泛地用草药治病，确有疗效，本草也就成为中药的总称，其实它包括玉石、草木、虫兽，但总称本草的原因是诸药中草木特多。历代以来，学者不断研究，本草学发展成为我国医药宝库，本草著作不知凡几，值得我国学者和世界医药界发掘研究。三十年来在党的关怀下，对国医这个宝库专精研究，成绩斐然，经络学说、针灸麻醉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就；欧美各国也競相钻研，认为中医中药大有可为。

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草药数千年来保障了中国人民生活和健康，立下了不朽功勋。历代有关本草著作，所在多有，大概分三类来源，大多数是专家编撰，有的是官修的，少数是地方印行的，现就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介绍数种如下：

(一)《神农本草经》，大概是秦汉时人托名神农而作，原书早佚，散见于历代本草著作转引中，明卢复和清孙星衍、周观光以及日本森立之等有辑本，共收药物365种，详述性味、功用和主治，疗效大多确实可靠，为我国较早的药物学文献。

(二)《新修本草》，一名《唐本草》，官修，苏敬等奉旨编撰。显庆四年(659)书成颁行，是我国第一部药典，原书目录一卷，本草二十卷，《药目》二十五卷，《图经》七卷，无存，后由梁陶宏补充校勘，增药物114种，共收药物800余种，广辑当时当地药物知识，并详药物的自然来源的分类方法。还收集全国各郡县所产的药物标本，绘制成图，为我国最早的药物图谱，也可能是世界上这类最早的图谱，对中药学的发展贡献很大。

(三)《证类本草》，全名《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宋唐慎微撰，三十二卷，元丰六年(1083)成书，系汇集增益《补注神农本草》和《图经本草》两书而成，收载药物1558种，多附药图，并记述药物的采集、炮制等方法，录方剂三千多首，后经艾晟、曹孝忠重刊或校订而改易名称，故亦有称《政和本草》的，传刻颇多，为医家所重。

(四)《本草纲目》，明李时珍（1518—1598）著，五十二卷，万历六年（1578）成书，全书共分十六部，六十类，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每种药物以“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等，“辨疑”、“正误”考证药品种真伪，和纠正历史记载错误，“修治”说明药物炮制各法，“气味”、“主治”、“发明”分析药物性味与功能，“附方”搜集历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共一万一千余首，历代医家药物一千五百十八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另附药物形态图一千一百余幅，内容极为丰富，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的成就。确是我国药物学、植物学的宝贵遗产，自万历十八年（1590）刊行以后，复制本甚多，并有外文译本在国外流传，为世界药物学、植物学界所重视，为国争荣，李时珍不愧为世界科学名人，他的塑像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科学名人像厅。

明代对于本草学的研究，成绩卓著，除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外，还有朱棣（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著《救荒本草》，搜集草本野菜四百十四种，每种详其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以备荒年之需。每种都有图说，书刊于永乐四年（1406），流传至今。

近年西方由民族学分出一支名“民族植物学”，研究以植物为原料的日用品，包括食、衣、住、行，有少数药物在内，和我国本草学以药物为主的不同。毫无疑问，我国先进。

(五)《滇南本草》三卷，旧题明兰茂撰，屈经增补，内容颇不一致，但其中有许多药物现在还在云南广泛应用。本书是地方性本草著作范例。

有清一代，对于本草学亦有研究、发展。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严丙亭等合编《得配本草》等，都足以补前人的缺漏，后书更是根据个人经验对于药物配合使用所起的相畏、相恶、相反、相制和相辅相成的生态作用，多所阐明。这对于药理学理论有进一步的发明，值得注意。

总之，本草学有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统，对中华民族的健康福利，起过保障作用。今后中西结合，精益求精，对于整个人类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黄帝内经·素问》，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字版。
2. 《黄帝内经·灵枢》，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字版。
3. (战国) 秦越人扁鹊：《黄帝八十一难经》。
4. (晋) 皇甫谧：《甲乙经》，各种版本。
5. (宋) 宋慈：《宋提刑洗冤集录》，1247年成书，历代版本。
6. (宋)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1624年成书，各种版本。
7. (明) 卢复辑本：《神农本草经》，各种版本。
8. (宋) 苏敬撰：《新修本草》(《编本草》)，旧版本。
9. (宋) 唐慎微：《证类本草》，旧版本。
10. (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各种版本。
11. (明) 朱棣：《救荒本草》，清代重版。
12. (清) 严雨亭：《得配本草》，旧版本。